

分立、联动与共生:环境治理中党规国法规范体系的协同逻辑

王楠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核心议题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党内法规正式纳入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标志着“党规”与“国法”从制度并行走向体系共构。在生态环境领域,这一关系尤为紧密且复杂: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写入宪法序言与党章总纲,形成了党规与国法价值同源的规范基础;另一方面,环境治理的公共性与跨域性,决定了单纯的法律规范难以有效覆盖党政领导干部等关键治理主体,党内法规的介入由此成为制度必需。

一、规范分立:二元结构的生成逻辑与功能分化

我国环境法治经历了从“国法先行”到“党规补强”的发展脉络。早期环境法律体系以《环境保护法》为核心,主要规范行政机关的环境管理行为与企业的排污行为。随着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环境治理的纵深推进日益触及地方党委的决策权力与党政领导干

部的政治责任,法律规范的约束力在此处出现结构性盲区。这一背景下,相关党内法规的出台,填补了法律规范难以触及的制度空间。国法以权利义务为基本范畴,遵循“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控权逻辑;党规以政治责任为核心范畴,体现“失职必问责”的监督逻辑。这种功能分化并非制度设计的缺陷,恰恰是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二、规范联动:衔接机制的实践展开

在规范分立的基础上,党规国法之间已然生长出多种形式的联动关系,即二者并非孤立运行,而是呈现出分工合作的整体样态。一是规范适用层面的功能互补,二是规范转化层面的程序衔接。功能互补集中体现于督察制度与责任制体系。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是党规国法协同的典型实践。它在党的领导下整合了政治权威性与法律规范性的双重治理效能,通过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的结构耦合,实现了对环境治理中“党政同责”原则的制度化表达。规范转化则是联动关系的另一种形

式。在特定条件下,党内法规所确立的制度安排需要通过国家立法程序转化为法律规范,从而获得更广泛的适用效力与更强的执行保障。这一转化过程并非简单的规范层级提升,而是涉及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两种逻辑的调适与融合,其本质是环境风险驱动下公共权力运行的责任重构。

三、规范共生:法典化时代的结构性整合

《生态环境法典》的出台,为二元规范体系的整体性重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一方面,法典通过立法目的、基本原则等条款,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重大理念转化为法律规范,实现了党的主张向国家意志的规范化转化;另一方面,法典作为生态环境领域的基础性法律,为党内法规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了合法性框架——督察制度、责任制规定、考核办法等均在法典确立的制度架构内运行。更重要的是,法典化推动了党规国法从“衔接”走向“共生”。“衔接”意味着两种规范之间的外在协调,而“共生”则意

味着二者在治理功能上的内在融合。在法典框架下,党规不再仅仅是国法的补充或替代,而是以其特有的政治动员能力与组织约束力,弥补法律在治理深度与灵活性上的不足;国法也不再仅仅是党规的外部边界,而是以其普遍性、稳定性和强制力,为党规的制度创新提供合法性根基。这种互补共生关系的实质,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格局”。

环境治理中党规国法的规范协同,并非追求整齐划一,而是在承认二元结构的前提下,构建持续生产治理合力的协同机制。从分立、联动到共生,这一逻辑揭示了中国法治理性:不执着形式统一,而致力于功能整合。随着法典施行,协同机制需在制度实践中不断调适完善。唯有如此,方能在环境治理中真正实现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实而富有韧性的制度保障。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纪检监察学院

双向赋能: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职劳动教育数智化变革与生态重构

摘要: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核心,以数智化为重要支撑,对高职劳动教育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出全新要求,而高职劳动教育数智化变革又能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形成双向赋能内在逻辑。当前,高职劳动教育面临数智化转型滞后、生态体系不完善等困境,难以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基于此,本文立足双向赋能视角,从数智化变革路径和生态体系重构维度,探索优化策略,通过理念、内容、模式革新,构建多元协同的劳动教育生态,实现二者同频共振,为高职劳动教育数智化变革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引。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高职劳动教育;数智化变革;生态重构;双向赋能

新质生产力是技术突破、生产要素优化、产业融合催生出来的先进生产力,其发展离不开具有数字素养、创新能力和劳动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高职教育是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劳动教育是立德树人的载体,肩负着培养适应新质生产力劳动者的重要使命。数智技术促使生产方式、劳动形态发生深刻变革,传统的高职劳动教育已经不能满足产业升级和人才培养的要求,数智化变革是必然的。劳动教育数智化转型可以反向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促进技术转化。因此本文从数智化变革与生态重构两方面入手,促进二者共同发展。

一、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职劳动教育数智化变革的意义

(一)高职劳动教育数智化变革的核心导向。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职劳动教育数智化变革要以双向赋能为方向,适应产业人才需求,反向赋能产业升级。坚持立德树人,把数智化与劳动精神、职业道德教育深度融合,培育学生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和数字伦理观。坚持产教融合,对接企业岗位标准,把数智技术、数字劳动技能融入教育内容当中,实现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坚持创新驱动,以数智技术为支撑,创新教学模式和评价方式,打破时空限制,提高劳动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高职劳动教育数智化变革的价值意蕴。高职劳动教育数智化变革是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具有重要的价值。在教育内容和形式上充实人才培养的元素,提高学生数字素养、创新能力、劳动技能,破解新质生产力人才瓶颈。从教育改革的角度来讲,能促使劳动教育理念、内容、模式全面革新,提高其现代化水平,丰富高职教育改革内涵。从产业发展角度来说,可以培养出具有数智劳动能力的劳动者,促进数智技术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实现教育与产业的双向赋能。

二、双向赋能视角下高职劳动教育数智化变革与生态重构路径

(一)革新教育理念,筑牢数智化变革思想根基。理念革新是数智化变革的前提,冲破传统劳动教育的束缚,树立双向赋能的数智化理念。高职院校要提高思想认识,把数智化转型纳入整体发展规划,推进劳动教育同数智技术、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摒弃重技能轻素养、重传统轻创新的理念,树立数智赋能、育人为本、产教协同的理念,重视学生综合素养的培养。加强师生数智化理念培育,促进教师提高数智技术应用能力,引导学生树立数字劳动意识,筑牢变革思想根基。

(二)优化内容体系,适配新质生产力人才需求。内容优化是数智化变革的中心,要以新质生产力的需求为依据,创建数智化劳动教育内容体系。对接产业数智化转型趋势,将数字技术、智能装备操作等内容融入课程,增设数字劳动、智能劳动等模块,取代传统滞后内容,实现与企业岗位需求精准对接。根据专业特点构建个性化内容,工科侧重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服务业侧重数字服务、智能运维,保证针对性和实用性。融合数智化内容与劳动精神、职业道德教育,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三)重构生态体系,实现双向赋能协同发展。生态重构是数智化变革的重要环节,需要创建起多元协同的劳动教育生态。建立校企协同育人生态,深化合作,推动企业参与改革,共建实训基地、共享教学资源,邀请企业技术骨干参与教学,实现教育与生产实践深度融合。创建师资协同发展生态,借助培训、研修等方式,提升教师数智技术应用和教学能力,塑造复合型师资队伍。构建评价监督生态,创建多元化的数智化评价体系,涵盖学生数字劳动技能、创新能力等,借助数智技术达成精准化的全过程评价,加强监督指导,促使二者协同发展。

三、结论

为新质生产力和高职劳动教育数智化变革的双向赋能,即人才培养同产业发展同步。破解转型困境,要以理念革新为先、内容优化为核、生态重构为要,促进劳动教育同数智技术、产教融合深度融合,培育出符合新质生产力的技术技能人才,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为高职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参考文献:

- [1]周宇婕.数智时代高职院校园林专业劳动教育体系构建[J].现代园艺,2026,49(02):198-200.
[2]田青青,孔兴欣,张平等.数智赋能:“岗课赛证”视域下高职院校专业劳动教育育人体系的探索[J].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中旬刊),2025(12):43-46.

作者单位:金肯职业技术学院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高校艺术设计教育能通过空间营造、视觉提升、文化转译、产品创新等深度介入乡村人居环境改善、文化品牌塑造、产业升级等环节,进而为乡村注入审美品质与创新动力。但“如何做”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实践,以下从多个维度提出具有可操作性和连贯性的策略,力求将高校的设计教育势能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持久动能。

一、推动育人导向从城市中心向城乡统筹转变

长期以来,高校艺术设计教育的人才培养重心主要集中在城市空间,课程案例多选取商业综合体、城市公共空间、都市消费场景等,而乡村议题则处于边缘位置。想要转变这种局面,需要从育人导向上进行转变,将乡村从教学内容的补充性话题提升为核心议题之一。具体实施中,高校应在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中明确写入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要求,将乡村人居环境设计、乡村文化品牌塑造、乡村产业视觉传达等内容纳入培养方案的核心框架,进而调整教育资源配置方向,使学生在接受设计训练过程中既具备城市设计的视野和能力,也能够理解乡村社会的运行逻辑,掌握面向乡村需求的设计方法。

二、构建校地协同的长效合作机制

艺术设计教育想要服务乡村振兴,不能停留在单次活动或短期项目层面,而应建立校地协同长效合作机制,目的是确保服务的连续性和深度。高校应与地方政府、乡村基层组织签订明确的合作框架协议,并将双方权利和责任清晰界定,包括人才培养专项项目的设立、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建立双向沟通和反馈机制等核心内容;在具体运作中,高校教师应定期到合作乡村开展调研,了解当地在设计领域的实际需求,并根据调研情况动态调整教学内容和实践方向,同时乡村方面也能选派人员到高校参与教学活动,为学生提供实践性指导和建议。此外,校地合作长效机制的构建还需有组织保障,通过在乡村挂牌设立实践基地、工作室或工作站等实体平台,为师生持续深入乡村提供稳定的空间依托,使艺术设计教育服务功能真正扎根于乡土土壤之中。

三、重构课程体系,嵌入乡村设计内容

传统艺术设计教育内容偏向城市设计语境,乡村相关知识明显不足,要想有效服务乡村振兴,高校应对课程体系进行系统性重构。具体操作中,高校可在景观设计课程中增加乡村生态沟渠规划、农田防护林体系设计、特色经济作物种植区的景观化改造等内容,在室内设计教学中融入乡村民居通风采光优化、农业生产工具收纳空间设计、乡土材料的现代加工与应用技巧,在视觉传达设计课程中引入乡村品牌形象设计、农产品包装设计、乡村文化视觉符号提炼等。除了在现有课程中嵌入乡村内容之外,高校还应开设独立的乡村设计方向课程,从政策解读、案例分析、理论构建等层面系统讲授乡村设计知识体系,为学生搭建起理解乡村生产规律、生态保护要求和产业发展逻辑的知识桥梁。

四、以真实项目驱动实践教学

高校将乡村真实项目引入实践教学,能

有效锻炼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比如将毕业设计选题向乡村方向倾斜,鼓励学生以具体村落为对象完成完整方案;在专业课程中设置“乡村出题、学校答题”环节,由乡村提出实际需求,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完成方案,成果直接交付乡村使用;以竞赛为平台,引导学生围绕乡村设计主题进行创作和比拼。

五、推进跨学科交叉融合,培养复合型设计能力

乡村振兴涉及产业、生态、文化、治理等,任何单一学科都难以应对这一复杂场域中的设计需求,因此高校艺术设计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时,应打破专业壁垒,推进跨学科的交叉融合。在学科层面,高校应推动设计学与建筑学、生态学、文化学、传播学等相关学科深度交叉,并引入数字化技术手段,使设计学科从传统的形态美学向系统化、可持续的方向转型升级;在教学层面,高校可组建跨专业的教研协同团队,将不同专业的师资、课程和科研平台整合起来,围绕具体的乡村设计项目进行协同攻关。

六、以文化挖掘与转译为核心的设计赋能路径

艺术设计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时,应将文化挖掘与转译作为核心路径,避免将城市设计模板简单复制到乡村场景中。具体而言,学生应在教师引导下深入调研乡村历史文献资料,并走访村中长者和非遗传人以及参与民俗活动来捕捉具有辨识度的文化符号。如独特图腾纹样、传统服饰色彩搭配、民间艺术表现形式等;完成文化素材收集之后,接下来要进行当代设计语言转译,目的是将传统文化元素以现代设计手法进行再创作,使其既保留文化内核,又具备当代传播力和市场价值。

结语:上述策略相互关联、层层递进,可打破高校与乡村之间无形的围墙,变单向智力输出为双向价值共生,让艺术设计教育在回应乡村真实需求过程中完成自身范式更新与内涵拓展。但策略落地不会一蹴而就,需要多方联合协同,包括高校自觉担当、地方政府制度配合、乡村社区主动接纳等,也需要在动态反馈与反复调适中不断校准方向。未来,高校艺术设计教育中可开设与乡村振兴直接相关的课程,为艺术设计教育成为滋养乡土文明、活化乡村风物、助力村民富裕的持久力量打下坚实基础。

作者系西安翻译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部设计系副教授

课题项目:陕西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课题“高校艺术设计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探索”(项目编号:SGH21Y0455)。

高校艺术设计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探索

刘腾蛟